

上

庆祝李伯谦先生

八十

华诞论文集

◎ 何弩 主编

李
下
蹊
华



科学出版社

李下蹊华

——庆祝李伯谦先生八十华诞论文集

(上册)

何 弩 主编



科学出版社

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李下蹊华: 庆祝李伯谦先生八十华诞论文集: 全2册 / 何弩主编. —北京: 科学出版社, 2017.2

ISBN 978-7-03-051745-6

I. ①李… II. ①何… III. ①商周考古—文集 IV. ①K871.34-5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7)第025598号

责任编辑: 李 茜 范雯静 / 责任校对: 邹慧卿 彭 涛

责任印制: 肖 兴 / 封面设计: 北京美光制版有限公司

科学出版社 出版

北京东黄城根北街16号

邮政编码: 100717

<http://www.sciencep.com>

中国科学院印刷厂 印刷

科学出版社发行 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

2017年2月第 一 版 开本: 787×1092 1/16

2017年2月第一次印刷 印张: 58 插页: 1

字数: 1 375 000

定价: 520.00 元(上、下册)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我社负责调换)

前言

2017年阴历二月初十，是我们的恩师李伯谦先生的八秩吉日。本该诸位同门弟子济济一堂，为恩师贺寿，同颂先生恩德。无奈恩师毅然决然不准我们搞活动为他祝寿，仅要我们将自己多年来在各自岗位上扎实工作和研究的心得，写成论文，集结出版，权作纪念。李老师特别强调，论文集只要研究论文，不要歌功颂德的回忆录。自2015年起，由何弩作为李伯谦先生八十华诞祝寿纪念论文集的组稿人，向李老师诸位弟子和部分与老师学术关系密切的学人，发出邀请函。至2016年6月底，在诸位师兄姐妹和相关学人的鼎力襄赞下，共收到论文稿件48篇，文图总计130余万字，成果颇丰，论文质量很高，篇篇真知灼见。随后何弩承担起主编责任，将文稿按照七个栏目进行归类编排。

第一个栏目题为“道器之论”，收录了7篇论文，主要探索考古学理论与方法。形而上者谓之道，这是指考古学理论；形而下者谓之器，这是指具体的考古方法论。李伯谦先生不论是在教学还是自己的研究中，特别注重考古学理论与方法论建设的探索、教育和引导，常年在研究生课程中开设“考古学理论与方法讨论课”，训练出一批又一批注重考古学理论的弟子，也影响了中国考古学界的许多学人。“道器之论”是弟子与学人继承和弘扬李伯谦先生注重中国考古学理论建设思想、展示最新理论思考的一个重要版块。当年，李伯谦先生提出和倡导的“考古学文化因素分析法”^①，对我们产生了重大影响，而今弟子与学人们对考古学理论的思考则更上层楼。孙庆伟、徐良高、赵春青、徐坚诸先生的文章主要涉及考古学本体论问题。刘绪、李海荣、雷兴山等先生的文章则涉及方法论。

第二个栏目题为“文明蕴化”，共收录了9篇论文，主要探索中国文明起源的相关问题。李伯谦先生虽然主要研究领域是青铜时代考古或称夏商周三代考古，但是也一直关注中国文明起源的探索。最初李先生提出各文明起源中心都在发展各自的文明因素，但只有夏代才形成最早的中国文明^②。近年来，先生发展了自己的中国文明起源

① 李伯谦：《文化因素分析与晋文化研究——1985年在晋文化研究座谈会上的发言》，《中国青铜文化结构体系研究》，科学出版社，1998年，294～296页。李伯谦：《论文化因素分析方法》，《中国青铜文化结构体系研究》，科学出版社，1998年，297～299页。

② 李伯谦：《中国文明的起源与形成》，《中国青铜文化结构体系研究》，科学出版社，1998年，38～50页。

理论，提出中国文明起源“古国—王国—帝国”三段论^①，“神权—军权—王权相结合以神权为主模式”和“军权—王权相结合以王权为主模式”^②，并就文明形成的判断提出了一系列理论标准^③，这些都在学界产生了很大影响。本论文集中，王幼平、何驽、王力之、宋建、武家璧、雷雨、林梅村、吴春明、王树明等9位学者，继续聚焦这一重大课题，论文探讨的对象在时间上从晚更新世到公元前2000年前后；空间上从黄河流域到长江流域，从中原到欧亚草原大通道，从陆地到海洋；内容上从考古学文化到精神文化，从经济基础到环境气候，多角度、宽视野地探索中华文明多元一体的一些具体问题，新见迭出。

第三个栏目为“三代遗珠”，共收录19篇论文，主要探讨青铜时代即夏商周考古相关问题。李伯谦先生教学和 research 的主要领域为三代考古，涉及黄河流域、长江流域夏商周时期考古学文化谱系与格局^④、夏文化探索、晋侯墓地、青铜器研究等^⑤。先生作为首席科学家之一主持的“夏商周断代工程”，首创了社会科学领域多学科、多单位、多学者团结合作、协同攻关解决重大课题的科研模式，在学界和海内外产生重大影响，在夏商周年代学和年表的建立方面贡献巨大。尽管夏商周断代工程始终有不同的声音在质疑，但是断代工程的课题模式和研究成果，成为后续的国家科技支撑项目“中华文明探源工程”开展的基础。李先生以博大胸襟，学术民主的情怀，对待不同的观点和学术争鸣。他也一贯支持我们这些弟子独立思考，不求与先生观点一致，甚至鼓励我们思想上天马行空，求证上小心谨慎。本论文集“三代遗珠”栏目的19篇文章，秉承李伯谦先生充分学术民主与自由的思想，用发散性思维，从各自的视角对夏商周三代文明进行深入探微，如同19颗珍珠，闪烁着斑斓的色彩。

第四个栏目为“历史钩沉”，收录了5篇论文。李伯谦先生的学生和弟子中，也有一部分转到历史时期考古领域中去了，而且同样也取得了不俗的成就。刘庆柱与李毓芳先生、董新林、郑彤和宋玲平的这4篇论文，虽然时代从西汉跨到明清，却分别从汉代工官管理制度、辽至明代墓葬制度、明清历代帝王庙祭统、紫禁城石雕艺术的角度，展示了统一多民族中国发展的点滴方面。

第五个栏目为“文字新探”，收录了5篇论文。夏商周考古研究中，古文字方法

① 李伯谦：《中国古代文明进程的三个阶段》，《文明探源与三代考古论集》，文物出版社，2011年，76～90页。

② 李伯谦：《中国古代文明演进的两种模式》，《文明探源与三代考古论集》，文物出版社，2011年，43～54页。

③ 李伯谦：《关于文明形成的判断标准问题》，《文明探源与三代考古论集》，文物出版社，2011年，71～75页。

④ 李伯谦：《中国青铜文化结构体系研究》，科学出版社，1998年，1～279页。

⑤ 李伯谦：《文明探源与三代考古论集》，文物出版社，2011年，91～372页。

的运用是不可或缺的。李伯谦先生的三代考古研究中，非常重视古文字分析佐证的运用^①，以晋文化研究最为突出^②。因此，李先生的学生和学术友人中也不乏工于古文字者。本论文集“文字新探”栏目中，除江林昌先生的文章是从文字、宗教与王权的角度考察国家与文明之外，顾万发、王长丰、彭浩、张春龙先生的论文均是对甲骨文、金文、简文探索的最新心得。

第六个栏目为“文博文保”，收录了3篇论文，却涉及博物馆、文化遗产保护、钱币文物研究三个不同领域。段勇先生是李伯谦先生的硕士和博士研究生，博士毕业后从事了故宫博物院的业务管理和国家文物局博物馆司的行政管理工作，因此他的论文是对中国博物馆理事会制度的理论思考。王纪洁女士也是李老师的研究生，毕业后分配到中国钱币博物馆工作，她的论文是她研究工作的心得。杜金鹏先生是李老师的学术益友，近年来实现了从考古学家到文化遗产保护理论家的华丽转身，在文化遗产保护的理论和实践方面多有创建，他为本栏目提供的关于“国家遗址公园的问题”的论文，值得玩味。

第七个栏目是“足迹实绩”，是孙庆伟先生满怀情感从学术史的视角，总结我们的恩师李伯谦先生朴实无华的成长经历，起伏跌宕的学术与教学生涯，实实在在的重大学术贡献。庆伟平实的行文毫无溢美之词，却饱含着对先生的敬仰与深厚的爱戴，代表我们同门弟子充分表达了对先生由衷的敬爱和祝愿。值得隆重推介。

另外还有一些同门弟子和学术友人也有意赐稿，襄赞李伯谦先生祝寿纪念论文集，却因种种原因，未能及时提供文稿赶上开始编辑，致使未能收入本论文集，我们在此谨致歉意！

总之，本论文集48篇论文，是李伯谦先生遍布天下的桃李弟子与学术友人最新学术成果的浓缩代表。“桃李不言，下自成蹊。”李伯谦先生就是那株繁荣却不惊艳的参天李树，我们就是那大李树下生长的小花，簇拥着先生指引的学术和做人的正路，趋向书山之巅、学海之涯。故而本论文集名曰“李下蹊华”，借学术成果以报答恩师多年来的培育之恩，借以庆贺恩师耄耋华诞！我们相信，本论文集才是李伯谦先生最乐意接收的生日贺礼！

让我们共祝：李伯谦先生寿比南山，永远健康快乐！

接下来，请诸位读者尽情分享后面正文的视觉与思想的盛宴吧！

执笔：何弩

① 李伯谦：《从殷墟青铜器族徽所代表的氏族的地理分布看商王朝的统辖范围与统辖措施》，《文明探源与三代考古论集》，文物出版社，2011年，136～171页。

② 参见李伯谦：《文明探源与三代考古论集》，文物出版社，2011年，303～372页。

目 录

前言·····	何 弩 (i)
---------	-----------

上 册

一、道 器 之 论

考古学与古史重建·····	孙庆伟 (3)
考古学研究中的解读与建构——关于考古学本体理论的一些思考 ·····	徐良高 (39)
论考古学文化及其命名原则 ·····	赵春青 (48)
金村镜像：考古学史和物质文化的建构 ·····	徐 坚 (60)
谈珠江三角洲地区沙丘遗址的“固沙发掘法” ·····	李海荣 (89)
漫谈田野考古图的表示法 ·····	刘 绪 (113)
周原遗址商周时期聚落分区方法刍论 ·····	雷兴山 (130)

二、文 明 蕴 化

嵩山东麓晚更新世古人类文化的发展 ·····	王幼平 (145)
黄河流域史前商品经济及其考古指标和相关问题试析 ·····	何 弩 (157)
从聚落分布看先秦时期晋南之气候变化——以涑水河流域聚落为代表 ···	王力之 (178)
良渚文化主神新证·····	宋 建 (192)
安徽含山凌家滩脩蛇山神祭山遗迹寻绎 ·····	王树明 (204)
陶寺观象台与文明起源探讨 ·····	武家璧 (236)
关于三星堆一期文化的几点认识 ·····	雷 雨 (259)
阿尔泰山和南西伯利亚青铜文化的新认识 ——2015 年俄罗斯远东地区考察散记·····	林梅村 (281)
中华文明形成期的陆海秩序 ·····	吴春明 (296)

三、三代遗珠

- 郑州出土商代青铜容器分期 秦文波 (313)
- 试论商洛东龙山遗址所发现的商代遗存 杨亚长 (333)
- 由金文“𠄎”论及商代都邑布局 唐际根 汤毓赞 (344)
- 六安淠河青铜大口折肩尊的风格与工艺研究
——兼及同类器物的时代与产地等问题 苏荣誉 宫希成 (359)
- 先秦城邑的城郭问题 段宏振 (422)
- 商周之际的文化植入与置换——以晚商王畿地区为中心 张渭莲 (444)

下 册

- 陈梦家先生青铜器研究成果考述 王 睿 (455)
- 殷墟文化的多样性——以陶质类容器为视角 牛世山 (464)
- 殷墟车马埋葬补议 常怀颖 (489)
- 三星堆凸目尖耳铜面像考 孙 华 (514)
- 西周南宫氏家族谱系试析 张天恩 (535)
- 陈庄西周城址性质分析 张国硕 (546)
- 西周时期的“丰” 曹 玮 (552)
- 春秋秦车的武备与工具 梁 云 (559)
- 辽宁东大杖子墓地出土的刻纹铜器及相关问题 白云翔 (573)
- 莒文化解读——一种文化发展模式的思考 刘延常 (585)
- 吴越贵族墓葬的等级研究 张 敏 (603)
- 沂水纪王崮与纪侯大去其国 任相宏 (676)
- 晋都新田新认识 田建文 (704)

四、历史钩沉

- 略论秦统一中国的物质文化基础——以长江流域为视角 张昌平 孙 卓 (719)
- 汉代工官研究——以汉长安城遗址出土骨签为例 刘庆柱 李毓芳 (736)
- 辽宋金元明墓葬制度初步研究 董新林 (765)

从历代帝王庙看统一多民族祭祀体系的形成	郑 彤 (772)
明清皇宫石雕艺术及其文化象征	宋玲平 (787)

五、文字新探

汉字与巫术、王权	江林昌 (803)
“商”字内涵新论	顾万发 (814)
殷周金文族徽类型与内涵研究	王长丰 (820)
《孙子算经》“今有孕妇”题的解说	彭 浩 (851)
益阳兔子山遗址三号井“爰书”简牍一组	张春龙 (859)

六、文博文保

中国博物馆理事会制度探析	段 勇 (871)
关于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建设的几个问题	杜金鹏 (878)
布币考证及相关问题研究	王纪洁 (884)

七、足迹实绩

李伯谦传记材料	孙庆伟 (901)
后记	何 弩 (912)

一、道器之论

考古学与古史重建

孙庆伟

(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 北京大学中国考古学研究中心)

古史重建是20世纪中国史学的重要话题，它直接催生了近代科学考古学在中国的诞生。一个世纪以来，中国考古学背负着重建古史的重任踽踽独行，缔造辉煌。审视考古学重建古史的世纪历程，既是展现学科贡献的有效方式，更是展望学科未来的必要举措。

一、古史重建呼唤考古学

晚清以来，尽管康有为等人的“上古茫昧无稽”说曾经发聋振聩，甚嚣尘上^①，但史界主流并不主张把中国上古史彻底抛弃，而是见仁见智地加以撮述，并致力于探究和建设真实的上古史^②。典型者如有为弟子梁启超，一方面认为“三皇之事若存若亡，五帝之事若觉若梦者，其确实否，万难信据”，“故中国史起笔于夏禹，最为征信”；但同时又强调“黄帝为我四万万同胞之初祖，唐虞夏商周秦之君统，皆其裔派，颇有信据”，“黄帝以后为有史时代”。梁任公这种看似矛盾的表述，其实正折射出民国史家普遍的心态——既不满足于全盘接受史籍记载而落入“泥古”的泥淖，但又因为长期浸润于传统史学，对古史体系难以割舍。在风起云涌的时代大潮下，以新方法重建古史势在必行，进化论、唯物史观相继登上历史舞台，而刚刚传入中国的近代考古学则被普遍地寄予了厚望。如梁启超在注意到“欧洲考古学会专派人发掘地中遗物，于是有史以前之古物学遂成一学派”的同时，也在憧憬“以此学说为比例，

① 康有为《孔子改制考》卷一开首即是“上古茫昧无稽考”，指出“吾中国号称古名国，文明最先矣，然‘六经’以前无复书记。夏、殷无征，周籍已去，共和以前不可年识，秦、汉以后乃得详记”，故断言“夫三代文教之盛，实由孔子推诂之故”。《康有为全集》（第三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2页。

② 拙文《疑古还是信古：民国史家对待古史的基本态度》，待刊稿。

以考中国有史以前古史，决不为过”的美好蓝图^①。

无独有偶，“新史学的开山”王国维1925年在清华国学研究院讲授“古史新证”课程，针对传说与史实的纠纷，信古或疑古太过之倾向，提出了著名的“二重证据法”：

研究中国古史最为纠纷之问题，上古之事传说与史实混而不分。史实中固不免有所缘饰与传说无异，而传说之中亦往往有史实为之素地，二者不易区别，此世界各国之所同也。……皇甫谧作《帝王世纪》，亦为五帝三王尽加年数，后人乃复取以补太史公书，此信古之过也。至于近世，乃知孔安国本《尚书》之伪，《纪年》之不可信。而疑古之过，乃并尧、舜、禹之人物而亦疑之，其于怀疑之态度及批评之精神，不无可取，然惜于古史材料未尝为充分之处理也。吾辈生于今日，幸于纸上之材料，亦得地下之新材料。由此种材料，我辈固得据以补正纸上之材料，亦得证明古书之某部分全为实录。即百家不雅训之言，亦不无表示一面之事实。此二重证据法，惟在今日始得为之^②。

在20世纪初叶，不惟梁启超呼吁发掘地中之物来考中国古史，也不仅是王国维通过“二重证据法”对古史进行新证，越来越多的民国史家都盼望以考古材料来弥补上古史研究中的文献不足征，廓清何为史实、何为传说，进而建设真实的中国古史。如以“冷静、客观、勤力、谨慎”著称的吕思勉在这一时期也对考古学情有独钟^③，他说：

茫昧的古史，虽然可以追溯至数千年以上，然较诸民族的缘起，则是远后的。所以追求民族的起源，实当求之于考古学，而不当求之于历史。考古学在中国，是到最近才略见曙光的。……考古家安特生，J. G. Andersson，因谓中国民族，实自中亚经新疆、甘肃而来。但彩陶起自巴比伦，事在西元前三千五百年，传至小亚细亚，约在西元前二千五百至二千年，传至希腊，则在二千年至一千年，俄属土耳其斯单早有铜器，河南、甘肃、青海之初期则无之，其时必在西元二千五百年之前，何以传播能如是之速？制铜之术，又何以不与制陶并传？斯坦因Sir Aurel Stein，在新疆考古，所得汉、唐遗物极

① 梁启超：《中国史叙论》，《饮冰室合集·文集之六》，1~12页。有关康梁师徒在学问上的分歧，梁启超本人即有详细描述，他说：“其师好引纬书，以神秘性说孔子，启超亦不谓然。……启超自三十以后，已绝口不谈‘伪经’，亦不甚谈‘改制’。而其师康有为大倡设孔教会定国教祀天配孔诸义，国中附和不乏。启超不谓然，屡起而驳之，……然持论既屡与其师不合，康、梁学派遂分。”参看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东方出版社，1996年，78~81页。

② 王国维：《古史新证——王国维最后的讲义》总论，清华大学出版社，1994年，1~3页。

③ “冷静、客观、勤力、谨慎”是严耕望对吕思勉的评价，参看《通贯的断代史家——吕思勉》，《治史三书》，176~181页。

多，而先秦之物，则绝无所获得，可见中国文化在先秦世实尚未行于西北，安特生之说，似不足信。……然则中国文化，在有史以前，似分东、西两系。东系以黑陶为代表，西系以彩陶为代表，而河南为其交会之地。彩陶为西方文化东渐的，代表中国固有的文化的，实为黑陶^①。

而治史充满了“浪漫的性格”的郭沫若不仅对“罗王之学”表示了充分的肯定^②：

在中国的文化史上实际做了一番整理工夫的要算是以清代遗臣自任的罗振玉，特别是在前两年跳水死了的王国维：……罗振玉的功劳即在于为我们提供了无数的真实的史料。他的殷代甲骨的蒐集、保藏、流传、考释，实是中国近三十年来文化史上所应该大书特书的一项事件。……大抵在目前欲论中国的古学，欲清算中国的古代社会，我们是不能不以罗、王二家之业绩为其出发点了^③。

并且身体力行，花费了大量精力对出土资料进行了整理与研习：

在撰写这两篇论文的过程中（引者按，指《〈周易〉时代的社会生活》和《〈诗〉〈书〉时代的社会变革与其思想上的反映》），郭沫若深深感到，研究中国古代社会仅仅依靠文献材料尚有缺憾，于是他便把研究的重点临时“转移到了资料选择上来”。他说：“我想要找寻第一手的资料，例如考古发掘所得的，没有经过后世的影响，而确确实实足以代表古代的那种东西。”为此，他决定中止写作，集中时间和精力钻研殷代的甲骨文和殷、周两代的青铜器铭文。1929年夏，在几个月的时间里，他研读了当时出版的几乎所有的甲骨文和青铜器图录的铭文和考释，并创造性地将古代史研究与古文字研究结合起来，写出17篇新意迭出的考释文章，后结集《甲骨文字研究》出版^④。

古史重建的愿景直接催生了中国第一个考古学专门机构——北京大学国学门考古学研究室。1921年，北大国文系教授沈兼士受蔡元培校长的委托负责筹建北大国学门，草创伊始，沈兼士等人就对考古学给予了极大的重视。他后来回忆说：

民初，蔡元培长北大，初设史学系，大家都不大重视。凡学生考不上国文学系的才入史学系，但这不能不算打定了史学独立的基础。至于材料和方法方面倘若不革新，仍同先前一样呆板板地从纸堆中钻研，那是不能满足

① 吕思勉：《中国通史》，301、302页。

② 郭沫若在《中国古代社会研究》后记中称，“我自己的兴趣是在追求，只想把没有知道的东西弄得使自己知道。知道了，一旦写出过，我便不想再写了。这是我的一个毛病，也许就是浪漫的性格。”《郭沫若全集·历史编》卷1，人民出版社，1982年，312页。

③ 郭沫若：《中国古代社会研究》自序，《郭沫若全集·历史编》卷1，6~10页。

④ 林甘泉、黄烈：《郭沫若与中国史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13、14页。

新时代求真的希望的。所以北京大学于民国十一年（1922年）设研究所国学门，首先创考古学研究室，其旨趣是把自来所谓供文人赏玩的古董，用考古学的方法去发掘搜集，作综合比较的研究。史学方面凭空添了一支强有力机械化生力军，古代史上许多问题，或者得了解决，或者起了疑问，这都是研究古代遗迹遗物之收获，予史学界以极大的冲动。……近代史学之新发展，多借助于考古学及民俗学，纵横经纬，合起来便成一种新的史学^①。

由此可见，自20世纪初叶以来，借助考古学来重建古史已成为学界共识，在此大背景下，史学家对中国上古史的认识开始了从“文”到“物”的转变^②。然而，无论是梁启超、王国维，还是郭沫若或沈兼士，这些学者大抵为文献史家，对于考古学是心有余而力不足。真正付诸实践，并以科学的、成系统的考古工作来重建中国古史者则当推中央研究院的傅斯年、李济和北平研究院的徐旭生、苏秉琦，前二人共同缔造了中国考古学的“史语所”传统，而在徐旭生的引领下，苏秉琦在日后开创了考古学的“中国学派”，古史重建由理想变为现实。

二、傅斯年与李济的古史重建

史语所本是“无中生有”的志业，傅斯年创建史语所之目的，不仅是要“把历史学语言学建设得和生物学地质学同样”，更是要“科学的东方学之正统在中国”^③。

如果追溯起来，傅斯年的这一理想当缘于他对中国传统学问的极度不满。他在北大求学阶段，就曾著文列举中国学术的七大弊端，以及由此弊端而形成的“教皇政治、方士宗教、阴阳学术、偈咒文学”^④。因此，年轻的傅斯年对“国故”“国学”甚为不屑，迫切希望能有专门机构来建设科学的新学术：

向者吾校性质虽取法于外国大学，实与历史上所谓“国学”者一贯，未足列于世界大学之林；……期之以十年，则今日之大学固来日中国一切新学术之策源地^⑤。

① 沈兼士：《近三十年来中国史学之趋势》，原载北平《经世日报》1946年8月14日“读书周刊”第一期，此据《沈兼士学术论文集》，中华书局，1984年，371～374页。

② 参看查晓英：《中国现代考古学的思想谱系》第一章“从‘文’到‘物’”，四川大学出版社，2014年。

③ 傅斯年：《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收入欧阳哲生主编《傅斯年全集》卷三，湖南教育出版社，2000年，3～12页。

④ 傅斯年：《中国学术思想界之基本谬误》，原载1918年4月15日《新青年》第四卷第四期，《傅斯年全集》第一卷，21～28页。

⑤ 《〈新潮〉发刊旨趣书》，原载1919年1月1日《新潮》第一卷第一号，《傅斯年全集》第一卷，79～82页。

自然地，傅斯年很早就萌生了用科学方法来研究中国学问的念头，他说：

把我中国已往的学术、政治、社会等等做材料，研究出些有系统的事物来，不特有益于中国学问界，或者有补于“世界的”科学。中国是个很长的历史文化的民族，所以中华国故在“世界的”人类学、考古学、社会学、言语学等等的材料上，占个重要的部分。……研究国故必须用科学的主义和方法，绝不是“抱残守缺”的人所能办到的^①。

可以说，年轻时代的傅斯年对“科学”的崇拜近乎于迷信，以至于一度对北京大学“哲学门隶属于文科之制度，颇存怀疑之念”，认为研究哲学者必须具备自然科学知识，并上书蔡元培校长力请“使哲学门独立为一科”，全校设置由“文、理两科”，“变作哲、理、文三科”^②。

1919年12月26日，傅斯年由北京出发去上海，前往英国伦敦大学大学院留学。^③他自述留学动机和计划是：

我将来要专那门科学，现在还不会定。但以心理学为心理的、社会的科学之根源，我至少以三年的功夫去研究它。在研究它以前，去研究动物学、生理学、数学。如此迂远，成功上实在讲不定。但我宁可弄成一个大没结果，也不苟且就于一个假结果^④。

王汎森据此分析，傅斯年在英国求学的“主要目标是一方面摒弃代表着中国思维方式的模棱两可、过于笼统和形而上学的思维方式，同时运用一些实验的、观察的和数理分析的方法探求人类思想的深层”^⑤。

傅斯年这种无畏的、不功利的探求，当然是难能可贵的。这不仅仅在于他对科学的信奉，更在于早早就抱定了这样的宗旨，即“无中生有的去替中国造有组织的社会，是青年的第一事业”^⑥。他后来曾经有过这样的自我评价：

病中想来，我之性格，虽有长有短，而实在是一个爱国之人，虽也不免好名，然总比别人好名少多矣。心地十分淡泊，欢喜田园舒服。在太平之

① 傅斯年：《〈毛子水国故和科学的精神〉识语》，原载1919年5月1日《新潮》第一卷第五号，《傅斯年全集》第一卷，262、263页。

② 傅斯年：《傅斯年致校长函》，原载1918年10月8日《北京大学日刊》，《傅斯年全集》第一卷，37~40页。

③ 参看《傅斯年先生年谱简编》，《傅斯年全集》第七卷，404页。

④ 傅斯年：《留英纪行》，原载1920年8月6、7日《晨报》，《傅斯年全集》第一卷，399~402页。

⑤ 王汎森：《傅斯年：中国近代历史与政治中的个体生命》，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2年，61页。

⑥ 傅斯年：《青年的两件事》，原载1920年7月3日~5日《晨报》，《傅斯年全集》第一卷，384~388页。

世，必可以学问见长，若为政府persecuted，也还如是，惜乎其不然也。……我本心不满于政治社会，又看不出好路线之故，而思进入学问，偏又不能忘此生民，于是在此门里门外跑去跑来，至于咆哮，出也出不远，进也住不久，此其所以一事无成也。今遭此病，事实上不能容我再这样，只好从此以著书为业，所可惜者，病中能著书几何，大是问题耳^①。

那么，在寻找到“科学”的史学研究方法之前，傅斯年又是如何看待中国古史呢？在北大求学期间，傅斯年曾著文认为：

周平王东迁以前，世所谓唐虞三代，此时期中，虽政治不无变化，而其详不可得闻，既无编年之史（《竹书纪年》不足信），又多传疑之说（夏殷无论，即如两周之文王受命，周公居东，厉王失国诸事，异说纷歧，所难折中）。惟有比而同之，以为“传疑时代”。盖平王以降，始有信史可言也^②。

以周平王以降为中国信史的开端，这种观点不可谓不激进，但也恰好突显“五四”时代的社会风尚。对于信史之前的神话传说，傅斯年的判断是：

就中国论，古来一切称帝之神王皆是宗神（tribal gods），每一部落有其特殊之宗神，因部落之混合，成为宗神之混合，后来复以大一统思想之发达，成为普遍的混合。《尧典》所载尧廷中诸人，……其来源皆是宗神，即部落之崇拜。后来或置之于一堂，或列之于多系，其混合方式要不出于战伐的，文化的，思想的。两民族或两部落攻战之后，一败一胜，征服人者之宗神固易为被征服者所采用，有时被征服者之宗神，亦可为征服人者所采用。文化高者之宗神固可为文化低者因文化接触而采用，有时亦可相反，本非一系一族之部落，各有其宗神，后来奉大一统思想者，亦可强为安置，使成亲属。此等实例累百累千，世界各地之古史皆有之，不以中国为限矣^③。

在欧洲七年间，傅斯年的学习和生活状态给人以“杂乱、颓放”之印象，但这种散漫的治学方式却令他最终成长为一个中国现代学术的设计师^④。在他的留学后期，傅斯年对于中国古史已有了新的认识。在他给顾颉刚的论古史书中，我们可以读到他的以下看法：

三百（年）中所谓汉学之一路，实在包括两种学问：一是语文学；二是史学、文籍考订学。这两之外，也更没有什么更大的东西，偶然冒充有之，

① 1942年2月6日傅斯年致胡适信，《傅斯年全集》第七卷，234、235页。

② 傅斯年：《中国历史分期之研究》，原载1918年4月17~23日《北京大学日刊》，《傅斯年全集》第一卷，29~36页。

③ 《性命古训辨证》，《傅斯年全集》第二卷，570页。

④ 王汎森：《傅斯年：中国近代历史与政治中的个体生命》，72页。